

革命烽火熔铸燕赵文脉

人民意志与历史图景

——评《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史》



□郑恩兵

抗日战争时期，燕赵大地成为敌后抗战的主战场。随着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一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文化宣传运动轰轰烈烈地在燕赵大地展开。来自五湖四海的文艺工作者像涓涓溪流，不断汇入河北广阔的抗战洪流中，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畏艰辛、不惧牺牲，在苍茫逶迤的太行山、燕山的崇山峻岭中，在滹沱河、永定河、滦河、漳河、滏阳河、桑干河两岸，渤海之滨，以笔为号角，吹响胜利之歌。这支队伍汇聚了丁玲、周巍峙、陈荒煤、邓拓、孙犁、赵树理、贺敬之、艾青、田间、杨沫、吴伯箫、卞之琳、杨朔、魏巍、吕骥、光未然、沙可夫等艺术家，他们在古老的燕赵大地上，以独特的创作个性、审美趣味，谱写了众多风格各异、瑰丽多姿的红色经典。

在冀中，以周巍峙、孙犁、沙可夫、田间、康濯、杨沫、杨朔、魏巍、萧也牧、萧军、周而复、秦兆阳、梁斌、李英儒、仓夷、曼晴、沙飞、沈重、李劫夫、曹火星、崔嵬、胡可等为代表的文艺队伍，以《晋察冀日报》《诗建设》《晋察冀画报》《文艺通讯》等报刊为阵地，创作了《地雷阵》《腊梅花》《燕嘎子》《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二小放牛郎》等大量优秀作品。旖旎秀丽的荷花淀赋予了孙犁灵动、清新的笔触，在其创作生涯中，他以诗性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幅冀中根据地抗战军民战斗和生活剪影。他在抗战时期创作的《荷花淀》

《琴和箫》《芦花荡》《丈夫》等作品构成一道独特而靓丽的抗战文学风景线。被闻一多称为“时代鼓手”的诗人田间把发韧于延安的墙头诗在晋察冀边区推向了高潮。他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与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的《王九诉苦》、阮章竞的《漳河水》成为解放区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诗歌作品。作为战地记者的杨朔、魏巍以速写的形式，发表了众多关于河北抗战的优秀散文和报告文学，并由此成长为新中国的重要作家。

始终战斗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日报》被聂荣臻称为“民族的号筒”。报纸所刊发的文艺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集思想性、宣传性、文艺性、大众性、民族性、通俗性、时效性、革命性为一体，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边区文艺创作的杰出成就。在十余年的办报史上，《晋察冀日报》共出版《海燕》《晋察冀文艺》《子弟兵》等文艺副刊20余种，总期数达600余期；发表小说300余篇，诗歌300余首，散文、报告文学5000余篇，歌曲50余首，美术作品200余幅。丁玲、艾青、田间、杨朔、杨沫、萧也牧、萧军、李季等作家的作品汇聚成强大的力量，成为文化抗战的锐利武器。

活跃在太行山麓及漳河、滏阳河两岸的赵树理、阮章竞、吴伯箫、鲁藜、李尔重、胡奇等作家，引领着冀南地区的文艺创作。20世纪40年代，代表着解放区文艺发展方向的赵树理，根据个人体验和实际生活，以其特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燕赵大地留下了《邪不压正》《小经理》《地板》等小说以及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1949年，因抗战远离故乡的广东诗人阮章竞，经过多年创作积累，带着对陪伴自己多年的漳河以及漳河两岸人民群众的炽热情感，创作完成了在中国现代诗歌史具有重要地位的《漳河水》。

随着张家口的解放，大批文化人士、文艺团体纷纷从延安和晋察冀来到张家口，张家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文化中心。1945年8月下旬，挺进剧社、群众剧社、抗敌剧社、前线剧社等晋察冀边区剧社，相继进驻张家口。1945年11月、1946年1月，由艾青、舒强、江丰带领的华北文艺工作团，由沙可夫、吕骥带领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分别从延安来到张家口。至1946年初，张家口会聚了来自延安和晋察冀的3000余位文艺工作者。天津《大公报》赞叹道：“如果按人口与文化人的比例，恐怕张家口是文化气息最浓厚的城市。”

以周扬、艾青、丁玲、萧三、贺敬之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家和以成仿吾、邓拓、田间、康濯、杨沫、杨朔、魏巍为代表的边区文艺家会师张家口，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先后创办了由成仿吾任校长、周扬任副校长的华北联大，由吕骥任团长，周巍峙、张庚任副团长的华北联大文工团，在原有的《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等报刊基础上，建立了由丁玲任主编的文艺月刊《长城》，成仿吾任主编的《北方文化》，刘国华、欧阳凡海任主编的《民主青年》，杨沫、文路任主编的《时代妇女》等报刊，除了原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和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张家口分会等文艺团体外，还共建了北方文化社、察哈尔文联、张家口市曲艺协会，解放区文艺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此期间，诗歌《人民的城》《欢呼》《解放张家口》《看见妈妈》《寄张家口》《在草原上》，小说《我的两家房东》《鸡毛信》《红石山》《解放了的虎列拉》，散文《孔家庄纪事》，戏剧《瓦窑工》《枪》，歌曲《铁路工人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美术作品《平北写生》《毛主席浮雕像》等，代表着解放

区文艺创作的新高度。

燕赵革命烽火所催生的文艺作品，始终以人民群众为创作主体、服务主体和参与主体，将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文学”真正发展为“大众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在文韵方面，或悲壮激烈，或清新自然，或敦厚朴实，或豪迈壮阔，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品格、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这些文艺作品和创作理念，深刻影响着河北文艺和新中国文艺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伊始，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走出的孙犁、康濯、梁斌、徐光耀、李英儒、邢野、雪克、管桦、李满天、张庆田等作家，以手中的笔，重温那段历史记忆。孙犁《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山地的回忆》《吴召儿》，徐光耀《平原烈火》，杨沫《苇塘记事》，李英儒《战斗在滹沱河上》，管桦《小英雄雨来》，刘真《好大娘》《我和小荣》等一大批优秀作品问世。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鼓舞下，革命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大量涌现。在革命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成为这次河北文学繁荣的主力，梁斌《红旗谱》、雪克《战斗的青春》、刘流《烈火金刚》、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敌后武工队》、徐光耀《小兵张嘎》等作品，将那段历史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这些文艺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写实主义文风、浪漫主义情怀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色彩，激励和感染了千千万万读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并成为中国红色文学的主流，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作品中塑造的朱老忠、李勇、吴召儿、雨来、嘎子等英雄群像，所描绘的白洋淀、冀中平原、巍巍太行的风土人情，以及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早已熔铸为弥足珍贵的燕赵文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者的心理、思维、情感和观念，指导和引领着河北文艺不断走向繁荣。

□于洋

面对近现代美术史上诸多的艺术家、作品与艺坛现象，我们该如何梳理一百年来中国革命美术的发展历程？如何解析美术创作的精英诉求与人民大众的现实需求？如何理解美术作品“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辩证关系？近读尚辉的学术新著《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史》（河北美术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深感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探索与阐释。一方面，其在叙事方法上编年体与通史叙事相得益彰，摆脱了以往惯常美术史写作的单一轴线叙事，同时穿点成线，汇线成面，既建构、呈现了中国革命美术史脉的多元性与立体性，亦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于陷入“就事论事”而缺乏整体观照的流弊；另一方面，该书以大量一手文献材料、精选作品图像与历史照片，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壮阔的全息历史图景、一阙动人的红色交响诗。

作为首部系统梳理、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美术史脉的著作，该书对“革命美术”概念进行了深层阐释和价值重塑，进而对社会主义艺术理论与文化理想的建构进行了全面深入解析。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近百年中国美术纷繁复杂、风起云涌的发展历程，该书以深厚的学术立论与清晰的逻辑结构，“从对革命美术、进步美术、社会主义美术和社会主义主流美术的艺术史的演变历程中，梳理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与建立的新型美术形态”。正如作者所说，在这个恢宏而壮阔的艺术史的展开中，人们还可以看到，美术家都曾谦逊地称为美术工作者，艺术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自觉地强调社会生活、现实生活、民众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把表现人性首先置于群体乃至民族的利益之中，把视觉审美的表现最终放到“真”与“善”的社会价值中去考量。如此深刻地认知与阐发美术家的创作立场和身份自觉，显现了该书叙事角度的设定思路和作者面对宏阔历史的冷静思辨。由此，该书以“革命美术的艺术演进历程”和“美术作品所展现的党的革命征程足迹”作为构成中国革命美术史的两条脉络谱系，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历史基点，聚焦党的文艺建设及其独特性，以美术创作形态作为切入点，梳理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变迁。

该书重视不同时期美术特有价值的总结，同时有意识地对近代以来中国美术的创作流派和地域流派进行了总结与梳理。书中“新中国美术基本价值观的确立”“建构多样、多元中的主流美术价值观念”等章节标题，即开宗明义地呈现了其与众不同、大事记式的历史铺叙的不同。作者在书中明晰地提出中国近现代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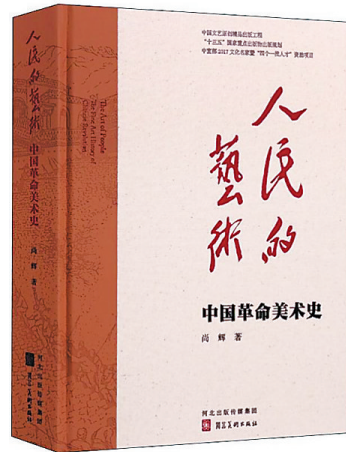
术史叙事中的“学派”概念，如从延安文艺运动对于大众的、民族的美术观念的确立，到以木刻、版画为主的“延安学派”；再如对中国地域性版画流派的叙述中，对于北大荒版画流派“景色深远、套色浓烈、生活气息浓郁”，江苏版画流派“烟雨迷离、清秀典雅的文人意蕴”等的精准描述与评析，都展现出作者在宏观视野中把握纷繁复杂的现象格局的敏感认知与归纳能力。

该书将文化政治与美术史叙事的视角有机结合，使其相互交织、并行不悖。如在第四章“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1949—1964）”当作者谈到“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催生新国画”的问题时，将中国画的现代“改良”思潮追根溯源，显现出美术史家的宏观视野；在第六章“解放与开放，破除种种精神枷锁与艺术藩篱（1976—1989）”的篇首，作者

从讨论塑造真实的领袖与英雄人物形象出发，讨论了新时期之初美术界对于“高大全”“三突出”创作模式的挣脱和对于典型人物“真实塑造”课题的正本清源。经典研究观念与经

世致用意识相结合，使得该书具有美术史研究与美术创作论层面的双重价值。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该书很多内容段落叙述上以学术文脉的视角切入，具体展开的则是美术创作本体层面的解读，这使得这种美术史叙事避免了隔靴搔痒式的玄谈空论，而更具现实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当下文艺方针政策的解读，能站在历史的视野和创作主体的立场进行诠释。如作者敏锐地看到，“新世纪以来，人们还可以看到，美术家都曾谦逊地称为美术工作者，艺术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自觉地强调社会生活、现实生活、民众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把表现人性首先置于群体乃至民族的利益之中，把视觉审美的表现最终放到“真”与“善”的社会价值中去考量。如此深刻地认知与阐发美术家的创作立场和身份自觉，显现了该书叙事角度的设定思路和作者面对宏阔历史的冷静思辨。由此，该书以“革命美术的艺术演进历程”和“美术作品所展现的党的革命征程足迹”作为构成中国革命美术史的两条脉络谱系，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历史基点，聚焦党的文艺建设及其独特性，以美术创作形态作为切入点，梳理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变迁。

如果站在美术史研究方法的视角，该书一方面延展了以《历代名画记》为代表的中国古画史写作“史论评”相结合的艺术特色，既具有史料汇集的工具书价值，又为当下乃至未来的美术史叙事提供了评价机制与价值方案；另一方面，感性“近观”和理性“远望”的学术姿态的变换与配合，也使该书能够自觉站在“以史带论，论从史出”的方法论，兼具史论的思辨性和艺术的本体性。这也正是这部中国革命美术史册所凝结、呈现的社会时代特色和艺术本体价值所在。



呈现接近历史真实的武则天

——评《武则天大传》

□王岚

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古今中外，对其研究者颇多。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武则天大传》（2019年7月出版）是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王双怀对武则天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以数十年之功，广泛涉猎有关武则天的权威史料，有血有肉地还原了武则天传奇的一生：从童年到入宫当才人、昭仪、皇后、皇太后，再到走向皇位，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改革，最后退出政坛，度过凄凉的晚年。文后附录武则天年谱、历代评价、武则天研究百年及海内外著作索引，力求多角度、全方位为读者呈现出一位接近历史真实的武则天。

该书特点体现在“三个新”上。一是材料新。除了常规材料之外，本书还搜集了有关武则天和武周社会的一些新材料，仔细排比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推翻了一些有关武则天的不实之词。比如，武则天为夺得皇后之位，扼

杀亲生女儿的故事，因《唐会要》《新唐书》有记载，似乎有一定依据，因此，故事流传至今。但作者通过分析《唐书》和《大唐新语》发现，书中虽收录了不少贬责武则天的资料，包括武则天与王皇后、萧淑妃斗争的全过程及残忍杀害王萧二人的过程，却没有“扼杀亲女”的记载。最重要的是，所谓“武则天扼杀小公主”之事发生在永徽六年初。史书明确记载：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而王皇后在永徽六年六月即被高宗限制自由。从永徽五年十二月末到次年六月仅半年时间，武则天是不可能生出一个公主的，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在永徽六年初“扼杀亲女”了。此外，还有《旧唐书》的记载佐证：“王皇后求巫祝厌胜，事发，帝大怒……将

废后……”原来，压倒王皇后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对武实施的“厌胜”之术。

二是见解新。书中，作者不囿于成说，没有人云亦云，而是通过分析资料，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史料的记载和影视作品的大肆渲染，让世人多觉得武则天虽有治世之才，但同时也是一个实行“酷吏政治”的残暴、荒淫之君。作者通过史料研究发现，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确实出现过一些酷吏，但综观其政治生涯，她基本是反对酷吏的，只是在改朝换代前后的特殊情况下，才把酷吏当成打击政敌的工具，而并没有实行“酷吏政治”。

三是形式新。为给读者提供更多详细、客观的资料，作者在文后用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做了四个附录——武则天



对教育的守候与探索

——评《滕大春文集》

□荆蕊

滕大春先生是我国新时期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学贯中西、治学严谨，躬耕教育七十载，在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理论领域成就斐然。在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滕大春文集》（2019年10月出版），既是对滕大春先生的缅怀，也是对上世纪外国教育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

文集宛若横贯古今的外国教育史画卷，以先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今贯通”的教育理念为轴，用详尽扎实的史料展示出国教育从远古到当代的发展脉络，在客观述评外国著名教育家的核心教育理论和欧美国家重大教育实践的基础上，用比较教育的方式给我

国现代教育实践提供有益借鉴。为再现滕大春先生在教育研究中的智慧、热忱、襟抱和修养，编辑在整理文集时秉持一切从旧的原则，对滕大春先生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系统性梳理。文集收录了《美国教育史》《今日美国教育》《卢梭教育思想述评》等专著，《科技发展时代的大学教育》《德国教育史》等译著，多篇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论文，滕大春先生在其担任主编的著作中独立撰写的章节，以及未曾公开发表的部分文稿，集结成精装6卷本。在编校过程中，编辑除对文章中的部分字、词、语法进行了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处理外，极大程度地还原了作品在首次发表时的原始面貌，全面真实地复现了滕大春先生熟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古与今、东与西、国与国之间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精湛分析，具有一定的研究、馆藏价值。

文集用大量笔墨叙述了欧美国家的教育史，史料充分、翔实，为系统了解西方教育发展历程、探寻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造了条件。文集还专门对卢梭、裴斯泰洛齐、鲍尔生、杜威等影响了欧美乃至世界教育发展方向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进行了论述和批判性解读。如，对卢梭兼具革命性和科学性的自然教育理论的积极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其思想中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予以客观剖析；对裴斯泰洛齐实施的“爱的教育”教育实践给予高度赞誉并在教育实践中合理继承和发扬。事实上，对众多教育家进行集中的专题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重大教育理论及其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教师的教育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此外，文集还收录了滕大春先生对古代东方教育的研究。基于详细考证，先生对两河流域古代学校考古发掘的研究、对古印度婆罗门教教育及佛教教育的研究、对古伊斯兰国家的教育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在学术界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研究历史绝非简单的史实堆砌，而是在错综复杂的演变中挖掘出潜在的规律、摸索出可供参考的经验，让陈旧而枯燥的历史焕发出生命的力量。滕大春先生将这一理念一以贯之，他在研究外国教育史的过程中，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将教育发展与教改重大变革置于大的社会背景和哲学渊源之下，先通晓其具体政策实施的目的和意义，再结合本国国情有选择性地借鉴其教育发展

中的重要经验，寻觅捷径，少走弯路，从而使青胜于蓝。例如，世界上许多国家常派出教育考察团外出学习，这种汲取他国经验的实践方式至今在制定各种政策时依旧行之有效，而研究外国教育史便是一种落实在纸面上的教育考察，也应给予重视。再如，美国在学习他国经验时常由某州某校开路先行，取得成果后才普及推广，我国后来所办的实验学校以及高考改革由某省某地率先实验，进而推广到全国便是异曲同工。这种先研究，再实验，最后总结推广的模式较为稳健，也利于在实验过程中及时将不足之处修订完善。

历史从不是割裂的，文化教育也不是绝缘的，诚如滕大春先生所言，“人类社会又息息相通，交流竞赛与日俱亟，闭关自守是行不通的。及时了解外国的好东西，并进而学习取法，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用心钻研教育，研究便有了温度；以历史来明鉴，史料便重获新生。研读《滕大春文集》，总能引起我们对教育理论和育人方法的思考，并获取解决某些教育难题的灵感。